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1-0097-07

陈名夏的八股文批评述略

陈水云 黎晓莲

[摘要] 明代不仅是八股文的形成发展期,也是八股文批评的发展和繁盛期,出现了众多在八股文批评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批评家,陈名夏以其对八股文制作的基本原则的阐述、明代重要大家制义风格的描述及晚明八股文坛流弊的批评而享誉明末清初的八股文坛,并对清代八股文选的编纂体例、选文标准、批评原则等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陈名夏;八股文;文体批评;八股文选;《国朝大家制义》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在明代八股文批评史上,陈名夏无疑是一位重要的人物。陈名夏(1601—1654),字百史,江南溧阳(今属江苏)人。少时曾游学山东、河北、徐淮等地,结交当时的社会名流,并与应社领袖吴应箕相友善,曾列名《留都防乱公揭》,崇祯十六年(1643)以一甲三名成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入清,先后为吏部尚书、弘文院大学士、秘书院大学士,顺治十一年(1654)以倡言“留发复衣冠”罪处斩。陈名夏才思敏捷,喜好诗文,先后有《石云居诗集》、《石云居文集》、《石云居制义》传世,并甚得当时文坛名家之称扬,其诗有方以智为序,其文有钱谦益、吴伟业、宋征舆为序,其制义亦有金文通、吴应箕为之序。他不但是崇祯时期著名的制义大家^[1](第490页),而且还编选了一部晚明时期最重要的八股文选《国朝大家制义》,并通过序、跋、书信的方式对八股文制作的基本原则、明代重要大家制义风格及晚明八股文坛流弊进行了较为全面地阐述和探讨,也为清代八股文选的编纂体例、选文标准、批评原则指明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

一、对晚明八股文流弊的反思

自明太祖确立以八股取士的制度,八股文从洪武时期起开始其繁衍发展的进程,经历了初创、繁荣、极盛到衰弱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一般认为,正德、嘉靖是明代八股文发展的极盛期,其体式正大,理充气足,并能融经史于制义,开拓出以古文为时文的新途,出现了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旂等在明代八股文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的“国朝四大家”。然而,盛极必衰,熟极必烂,八股文发展到万历末年,或讲机局,或尚才情,或喜词藻,唯独不讲恪遵传注以代圣贤立言。“这些八股文炫怪矜奇,标新立异,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因不遵从程朱理学,反而将离经叛道的思想与语言引入了八股之中,八股文已从根本上偏离了其创制宗旨。”^[2](第381页)影响所及,到天启、崇祯时期,八股文已完全是卑陋至极,对于这一时期的八股文风,明末清初学者是这样批评的,或谓之“空疏庸腐,稚拙鄙陋”^[3](卷二),或称其“背戾以浸淫于异端”^[4](第175页)。天启初期曾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朱国祚在《正文体议》中有更为详细地描述:“乃至于今,则又有深可叹者:艳词逞辨,穷极瑰丽,以骇里耳,为夸而已矣;旁引不经,过为诡诞,使人不可究解,为怪而已矣;雕镂刻画,棘棘滞物,以呈其工,为巧而已矣;掇拾陈言,以自粉饰,而无当于理要,为冗而已矣;数者之弊,相寻而已,而文体遂至于决裂。议者谓文之日趋于败,犹江河之趋海不复

返。”也就是说晚明八股文流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夸”、“怪”、“巧”、“冗”，归结起来就是在内容上悖离遵经守注的八股文统，在体式上则有违醇正典雅的文体规范。

为此，当时著名学者李廷机、凌义渠、沈承纷纷上“正文体议”、“正文体疏”、“正文体策”，要求在取士过程中准先辈法程，违者弗收，以正文风，认为唯有“务根本，绝浮华”，才能达到“可以疗文，可以疗人，并可以疗世运”的社会效果。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八股文也是如此，一种文风是一个时期社会风尚的晴雨表，万历末年以来文风的萎败是与当时的“世运”密切相关的，诚如俞长城所说：“有明之季，文体芜秽，晦冥蒙翳，与运相符。”^[5]《熊鍾陵稿》卷首刊“题识”）这个“世运”就是朝政腐败，纲纪不振，党争不断，教化失恃，人心散漫，世风衰落。然而，剥极必复，到崇祯时期，危亡的国势激发起人们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八股文坛也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在江南地区还形成以江西四雋为代表的豫章社和以张溥、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几社这样两支影响力较大的八股文派。豫章社主要是从恢复文风着眼，要求回溯到正德、嘉靖时期亦即国朝四大家时期以古文为时文的文风；而复社、几社主要是从重振士风入手，要求为文有益于世，八股文的制作亦要体现经世致用的精神，他们实际上是要恢复万历以来被人们已经抛弃了的儒家礼法；也就是说豫章社的主张偏于“文法”，而复社几社的主张重在“义理”。陈名夏虽然与复社诸子有交往，也很认同艾南英恢复唐宋文统的努力，但在这一问题上并不盲从，而是提出自己独特的救弊主张。

在陈名夏看来，晚明八股文坛，流弊丛生，为患甚多。“制义之道，溃乱已极。比日专尚偶对，诤为雕龙绣虎，其实败絮朽质，安所用之？学问义理，畏其拘拘尺度，好言事功权变，圣贤体用，毫无体究。专尚游侠权奸，不问何题？望而知为帝王大物矣；不知何解？望而知为主瓊琬琰矣。前辈篇法荡然无一存者，而南国得气之士多用此技。间有二三古学，不惑于流俗者，又因坊刻衰落，不能广布同好，以此益叹维挽之难矣。”^[6]（卷十五）他认为晚明八股文坛之流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专尚偶对，圣贤体用，毫无体究，这一点在他在与友人金之俊议论时说得更明白：“吾儒虽躬行不及圣贤，既已操觚伸纸，俨然代之立言，则必当设身处圣贤之地，发圣贤之论，奈何其相率为荒唐谬悠支离割竄之语句，入室而操之戈耶？”^[6]（卷首）他强调既为制义，则须代圣贤立言，恪守八股文自身的体制规范，而天启、崇祯以来制艺已偏离了这一正途：“文心沦丧”。他说：“予观古文至今日衰敝矣！稍有才力之士，皆至于摹拟而失真，如子由之所慨于剽夺珠贝、缀饰口耳者。其不及者则空谈以为泛览，重复以为游行，而古作者之意荡然尽矣。”^[6]（卷一《李舜良制义序》）何为“古作者之意”？他说：“予素好遵岩诸家，能按古作者之旨，归乎六经，顾好之者少，后遂剽夺支离而不可训，其能与荆川相上下鹿门、震川耳。”^[6]（《石云居文集自序》）又说：“予按古作者之旨，如韩、欧诸人，其于序事以感慨，辨析义理以曲折，可谓飒飒乎六经之遗矣！”^[6]（卷三《王守溪先生制义序》）“古作者之旨”就是《四书》、《五经》确定的儒家礼法，然而晚明文坛却将之束诸高阁，只是追求形式上的机巧和语言上的藻丽，其结果是空言误国，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和危机：“近年文体败坏，皆由二三好名以不知义理之言捷收科第之效，遂至相煽成风，相诱成习，而不知其非。《五经》、《性理》诸书，束之高阁，而巧袭六朝五季之浮艳。夫如是，安得不日寻于干戈变乱也乎？”^[6]（《答魏昭华》）

既然如此，如何救弊？陈名夏的主张是恢复正德、嘉靖时期体大式正、理醇义深的八股文风，也就是由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确立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八股文统。据其《自题石云居制义序》所云，知其曾师事明末制义大家方应祥。方应祥（1560—1628），字孟旋，西安（今浙江衢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初曾为山东布政司参政佾事。俞长城说：“读方孟旋文，幽奥坚固，质而弥文，殆有至性存焉。”^[5]（《方孟旋稿》“题识”）何以故？盖因孟旋为端人君子，“以君亲为天地，以朋友为性命，以吉人善类为头目脑髓”。其博学强识，茹古涵今，浩荡无涯，所为制义，亦自辟阡陌，浮天濯泉，笼挫万物。在钱谦益看来，方孟旋的制义，有如哑钟忽鸣，黄雉变雄，是以“醇正”之风扭转明末文坛的“浇漓”“萎败”。受其影响，陈名夏亦好为高洁绝俗之文，推崇正、嘉醇洁雅正文风。“明兴以来，弘演六艺之旨，而接以淡永渊著之说，莫如王遵岩、唐荆川、归震川诸先生。”^[9]（《陆长年集序》）他又以归有光为正德、嘉靖八股文的杰出代表，认为归有光的制义是后人所无法企及的，“震川制义茹无涯浚，若大海之澜，肆鱼龙而萃日月

也。”^[6]（《答吴骏公先生》）而陈名夏自己也是每拟制义，必以归有光为师法之榜样，他摹拟归有光的正是其以古文为时文、理充气足、体式正大的文风。金之俊为其《石云居制义》所撰之序文，便指出陈名夏的理想是要兼“理”“法”：“文之不朽于天地间者，有他道哉！理之为主，法之为辅而已矣。六经语孟之文，理之原，法之祖也。先秦两汉唐宋大家之文，附于理而不诡，绳于法而不佻者也。理不足则气索，法不足则格卑，气索格卑则古意荡然，不复有存焉矣。此近日制举之文所由弊也！然则救弊于今日，莫如勉学者以通经学古，盖能为古文辞者，未有不能为制举艺者也。昔王震泽、归震川、唐毗陵、茅归安诸君子，皆以制艺冠绝一时，而其议论必根本于经义，其开阖首尾，抑扬错综，必出于迂固、韩、欧、苏、曾数大家间，是以理明法备，其为制举艺无异其为古文词，故足传也。迄今百年余来，能为震泽诸公之古今文者，惟吾友陈百史先生。”^[6]（《陈百史先生石云居制义序》）

二、八股文的社会功用及其制作的原则与要求

随着晚明八股文蔽塞的丛现，关于八股文存废的议论亦随之而生。明末清初学者彭而述曾说：“予尝有言，文不可废，八股定当废，此时乃暂行之。若曰：入英雄彀中，亦犹行古之道也，其断断乎不可废者，如今之古文辞与诗歌乐府之类是也。”^[7]（《读史亭文集》卷三）其实，在万历时期就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观念：八股只是士人进身之阶，一旦跨过这一门槛，就再没有必要去问津它了。诚如王世贞在《与户部陈晦伯》中所云：“甫离此即从事学官，顾其所习，仅科举章程之业，一旦取甲第，遂厌弃其事。至鸣玉登金、据木天藜火之地者，叩之，自一二经史外，不复知有何书，所载为何物，语令人愤愤气塞。”为陈名夏所推崇的归有光亦有言云：“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然惟此学流传，败坏人材，其于世道，为害不浅。夫终日呻吟，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8]（《山舍示学者》）当八股文作为科举取士的国策，衍变成少数人巧取功名的工具，失去其规范人心完善人格的功能后，必然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非议之声，甚至在当时还出现了废科举而恢复荐举的议论。

在陈名夏看来，八股文是关乎国家取士的大业。“制义者，士之所以进身而为之赞也。古者见君之礼必以赞，我国家士非由科第，虽有长才异能，亦无从而进，故制义之道，君子重之。”^[6]（《明朝大家制义序》）虽然八股取士制度的确存有多种弊端，但绝不可因之废科举而重返荐举之途，原因在八股文取士目的是正人心，士子所习固为圣贤之言，却可藉以通达圣贤之心。这一看法与归有光所论，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归有光《山舍示学者》云：“第今所学者虽曰举业，而所读者即圣人之书，所称述者即圣人之道，所推衍论缀者即圣人之绪言。无非所以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陈说于吾前，独能殫然无概于中乎？愿诸君相与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窃。以吾心之理而会书之意，以书之旨而证吾心之理，则本原洞然，意趣融液。举笔为文，辞达义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远矣。”^[8]（卷七）通经汲古，本意在以圣贤之言涵化士心，通过士心之涵化让圣贤之言达到如自己出的地步，然而在陈名夏看来当时文坛却充斥着有悖上述原则的不良现象：“今之为经义者，不言圣贤言奸雄耳，不言仁义道德言机械变诈耳，故有圣贤定静安虑之学，而谬及于摯鸟伏击之术，圣贤布帛菽粟之教，而借为吹竹震兽之音。至于增益句读，径省字义，合比対偶，如狂醒不醒，作者不识所由来，而有司目诤心摇，私为帐中之宝而收之，抑知其足感人心、祸当世而莫之救哉！”不过，这些实乃有司失鉴之过，而非以经义取士之过，正所谓噎而废物，食而可废乎？有司实不知经义，而废经义可乎？接着，他进一步批评了主张废除经义取士的观点，指出王安石确立以经义取代诗赋取士乃时势所趋：“至于诗赋变为经义，则予必曰圣人之道所以常明常行者此耳！而后之人不察王荆公之有功于圣人，而耳食以为诋诃，且谓经义不足以取士而欲变之，岂非圣贤之罪人哉！”^[6]（《乙酉程墨选序》）

在周秦时期，古人“赋诗”意在考见王道盛衰、礼义兴废、政教得失，在明代通过八股文也能看出国家治乱之是非及人心教化之浅深，绝非流俗所说是仅为攫取荣利之捷径。陈名夏说：

呜呼！一代之得失盛衰见于是矣。乃今之为说者，制义求为科第何必工？将以悦时人之

耳目，将以悦时目而得显宦高第耳。将以得显宦高第而营其身家以及其后人耳。苟苟成科第而

去者亦足矣！抑思时人者，圣人之身也；高第显官者，时王之制也；身家后人又人心善端之克也；三者皆将于制义求之，而顾汲汲袭为一旦之术而忘其所自是，何资于制义者甚重以周而士为之甚轻以约也？^[9]《明朝大家制义序》）

他认为制义非仅仅是为了获到高官显第，其根本在于证“圣人之身”、“时王之制”、“人心善端之克”，所以说“一代之得失盛衰见于是矣”。在为陈道庄所选试卷作序时，他提出“观道”、“观世”之说：“予读而叹曰：此可以观道，又可以观世已。道蕴于精神性术之微，而发于语言声气之表；世极于治乱因革之变，而藏于音节抑扬之中。道与世交为感，而又与为无穷，则夫文者载道之器，而运世之本也。文不衷于道，骈技雕镂克沓于繁绘，使人有感于是非之未明矣。文不关乎世，则离歧于方隅，震荡于水火，使人有感于前后不相及矣。”^[6]（《试卷序》）文要载道，又要关世，这实际上就是要强调八股制作必须合乎儒家经世的思想，而不能只是作为逞才炫巧的表达手段。

陈名夏还强调八股文制作当“存心”、“主敬”，也就是对八股文要采取一种敬畏之心，应当从宣示儒家之义、张扬圣贤之心的立场理解“制义”，唯有这样才会使其八股文达到一个“求言合乎道”的高度。他说：

予又尝论之，行文之要，莫若存心。先辈自守溪而下，其勋业表表，卓冠当世，或见于馆阁侍从，或见于疆场荒域，或见于藩司守令，可谓盛矣！然以予观其行文，及尝考其师友渊源，莫不相戒勿为慢易无稽之辞以欺其心，而又以为身既见用于时，以至荣身家而及后人者皆至焉。是则君之所以待士者既盛矣，区区以词章之学而得之，而又皆为其易者不能求之于古作者之指，以发明圣贤之道，岂可谓之仁人乎哉！^[9]《明朝大家制义序》）

夫学者之文，岂不以敬肆分得失哉！主敬则神凝，神凝则气定，神与气相守而后发之为文词章句，断断可入圣人之道。古人所以积之数十年之力，使其存于中者，既已旁皇周浹而无浅泊拘畏之病，及乎放而为言，不敢有叫号嘻戏之习，必正襟危坐兢画尺寸而后得之，何也？道非文不载，文非道弗贵，六经而下，如韩欧诸君子，观其所以自明立言之意，何其艰而不苟也。故曰：文之至者，敬之至也。^[9]《天咫楼会课序》）

为文存心主敬，则不以有司之是非而是非，亦不以习八股者之穷达而为是非。在陈名夏看来个人之穷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写作八股文时是否有“主敬之心”。他认为如果只求获得有司之拔识，失却义理深长之味，反倒是“获罪于圣贤”，只有为理义之文才是有功于圣贤。因此，他引入韩愈关于古文创作的“不平之鸣”说，指出在八股文坛也大量地存在着穷而后工的现象。他在给周生於的信中说：“门下数致书皆不识所言何意，大率如韩子所云不为衣食所困，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耳！虽然衣食能困人，不困之时，其困人愈甚，如门下奇才刻思，何微不入？何坚不破？”^[9]（《与周生於》）又在为黄铨士所作制义序中说：“予于黄子益信文章遇合之权，在我而不在我也。在人者有司困人所以不能矣，在我者胜而不败，得而不失，而合于圣贤之义理通于当世之务，有司虽欲困以所不能，而我之文章足以夺其权而归于相信，此即韩子君相能为时而学靳胜乎已之说也。”^[6]（《黄铨士制义序》）

八股文对于创作主体不但有主敬的要求，而且还有阅历、学识、涵养、表达等方面的要求。陈名夏自述致力于此 20 余年，或数日而成一艺，或经月而未有成者，“惟日夜摩切义理，他无所异望”，其中甘苦实难尽言。他说：

所谓制义之难，求之于心而发之于言，以学者之言而代圣贤之心，其义可谓深矣，道可谓广矣！而欲以偶然而得之，岂可几乎？故学者之言如此，而圣贤之心如彼，此叛道而去不足数者也。即言或有当于圣人矣，以至于内外浅深，几微妙忽，有一之不当于圣贤。或其言则是而其人则非，而识者且有以知其言之未尝是也，此曷故与夫人之言未有不似其人者？诚能惕之以圣贤，陈之以万物，依乎和平，止乎义理，行文之时，兀坐一室，以己之心与圣贤之心相与问答，授受于百千载之上，渐得所谓合一无间而发之为词章，乃可以为制义之至，乃可以为言是而人亦是，否则神之啬也，气之漓也。其言则是，而人则非，去叛道者不能以寸矣。求如向之所谓羁宦奔走，感慨俯仰，杯酒流连，左朋右手而诗赋辄工者，今皆不可得矣，若是其难哉！^[6]（《白订制

义序》)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八股文写作的经验性总结,并指出八股文最基本的要求是“以学者之言而代圣贤之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在陈名夏看来,在行文之时,作者当凝思静虑,只有当其心与圣贤之心相叠合,这样写作出来的制义才会是“制义之至”。八股文写作固然应该以圣人之言为言,专一于孔、孟、思、曾,以圣人之言来涵化自己,但是个人的阅历和学识也对提高其八股文写作水平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阅历上,他主张作者当广其游历以得江山之助,其《祝尊光集序》云:“唐刘子蜕云:文有天地,此为好游者言耶,抑为未尝游者言耶。以予观于祝子,制义之伟人也,博闻立言,戢戢于函则,已尽得山川之胜矣。……祝子无事担簦蹑屩,傍徨山泽之间,述其所志,咏其所见,而一旦尽有诸胜,即予且驱驰数月,一遇祝子,所谓予得其形,祝子并得其意,若是祝子且得天助哉!”在学识上,他认为名家制义往往是“理”、“法”兼备,特别在“法”上更是涵盖百家而取众之长:“若制义之形声句读、格律意思,与唐宋以来之为古文者略相殊矣。而先辈之杰者,又兼而有之,凡五帝三王著其略,方内万物纬其运,日月星辰经其度,礼乐刑政百氏之书错集而不越杰者,又于制义兼而有之。”^[6]《明朝大家制义序》正因为这样,他主张初习经义,当广泛学习前人,他编订自己所作为《石云居制义》,便分拟古、拟先正、拟墨三部分。拟古部分是以古文为文,绝去对偶,专于断落处见其本怀;拟先正部分则以先辈法为文,宁淡毋浓,宁不足毋有余;拟墨部分则斟酌于古今之间,效时人所为整裕者然犹未至流入俗道者。“或为古朴而醇深,或为淡远而宕折,或为环玮而雄博,其遣词而词不同,其所以为理为法,一也。”

三、《国朝大家制义》及陈名夏的八股文批评实践

正如上文所说,晚明文坛流弊丛生,天启、崇祯之际已有豫章社、复社、几社等文社相继提出救弊的策略,编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选,为遏止晚明八股颓势提出救弊良方。叶梦珠《阅世编》卷八“文章”条云:

启祯之际,社稿盛行,主持文社者,江右则有艾东乡南英、罗文止万藻、金正希声、陈大士际泰;娄东则有张西铭溥,张受先采、吴梅村伟业、黄陶庵淳耀;金沙则有周介生钟、周简臣铨;溧阳则有陈百史名夏;吾松则有陈卧子子龙、夏彝仲允彝、彭燕又宾、徐闇公孚远、周勒卣立勋;皆望隆海内,名冠词坛,公卿大夫为之折节缔交,后生一经品题便作佳士。一时文章,大都骋才华,矜见识,议论以新辟为奇,文词以曲丽为美。

这些在江南地区出现的晚明文社,实际上就是以应考为目的的八股文社,其活动内容一般是以读书穷理、揣摩经义、练习应制文字为日常功课。为了便于社员学习和揣摩,这些文社往往会编选一些选本,收录成化、弘治以来的名家制义和社友文稿,艾南英有《明文定》、《明文待》,陈子龙有《六子会议》、周钟有《经义诸选》、钱禧有《同文录》、周钟有《复社国表》,这些文选通过批点的方式指出其文法、文理、文题等值得借鉴学习之处。在这些选本里,艾选与钱选尤为风动一时,另外,陈名夏的《国朝大家制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本。郑灏若说:“陈百史名夏有五十大家之刻,一时鸿文巨制囊括无遗,不惟示后学以先型,亦足以传诸人于不朽。”^[9](卷八《四书文源流序》)指出《国朝大家制义》具搜罗宏富、囊括无遗的特点,并有示后学以规矩、传诸人于不朽的重要意义。

《国朝大家制义》共42卷,明末陈氏石云居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收录有明代制义名家42人:成化朝1人,王鏊;弘治朝4人,钱福、李梦阳、王守仁、董玘;嘉靖朝11人,唐顺之、诸燮、薛应旂、茅坤、瞿景淳、王樵、周思兼、钱有威、王锡爵、许孚远、归有光;隆庆朝3人,胡友信、邓以赞、黄洪宪;万历朝23人,孙鑛、赵南星、冯梦祯、苏濬、杨起元、顾宪成、汤显祖、李廷机、邹德溥、万国钦、郭正域、叶修、陶望龄、董其昌、郝敬、吴默、顾天竣、沈演、舒曰敬、汤宾尹、孙慎行、黄汝享、许獬。从上述入选作者看,成化以来重要的名家基本囊括在内,但在各个朝代的入选数量上则是不均衡的,成化、弘治是八股文成熟期却只选5人,嘉靖朝是八股文全盛期也只选有11人,万历朝却入选人数达23之多,虽说它是八股文的新变期,颇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也有过多之嫌。其原因,陈名夏是这样解释的,一是先辈文多佚,二是以嘉靖以来时文正体为准,三是入选以文为主,以人为辅,入选诸家以其多有专稿又为学人所称者,非谓本朝

文实尽于此。尽管《国朝大家制义》在选目选量上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在时间跨度上不如钱选,在文法示范性上不如艾选,但是它作为一部入选规模庞大的选本有其值得称道之处。

在《国朝大家制义》前面的序文里,陈名夏述说了自己编选这一选本的意图:

先辈诸君子,道德积于中而英华见于外,应时王之制而克其任天下爱民物之心。予窃慕其人而欲天下因其言以求其见君之始。如水之赴于海,木之藉于土,而流长枝茂莫可得,而掩之抑之阻绝之者,盖有自也。陆贾曰‘悟之以文章’,陆机曰‘文扶质以立干,文垂条以结繁’,而韩退之曰‘闾中肆外’,苏子瞻曰‘行当行,止当止’,古人之论也,可谓祥矣!若制义之于形声、句读、格律,思兼古今之文法,又为特详而今之言之,日以益众,予皆不具论。独以先辈存心之学告天下,使天下知夫存其言者,所以学文,而即所以学道成人,非徒尚词家之能也。

在当时八股文选可谓多矣,陈名夏认为其关于形声、句读、格律言之众,自己编选《国朝大家制义》则是为了让先辈君子“存心之学”昭示天下,因此这一选文并没有当时流行选本着力于形声、句读、格律的点评等,只是在各人各卷之首有一篇小序抉发各家为人之特色及制义之风格,如果再将各家制义组合起来,并结合各篇制义之后的名家点评,它完全可视为一部有文、有论、有评的明代八股文史。

作为一部明朝大家制义的选本,它的意义在其对有明一代大家制义风格的基本定位。如钱福(鹤滩)“长于用实而不长于用虚”;董玘:“昔人称中峰之文无他长,惟熟于朱子《或问》耳”;诸燮(理斋)“先生文中逸品也”;薛应旂(方山)多容善蓄,“其文宁失之板重,毋失之佻达,器识裕如也,宁止一世之士欤”;茅坤(鹿门)“长于叙事而短于说理”、王樵“方麓之文,理学之文也”、汤显祖(义仍)“巧心俊发,鲜采动人”、万国钦(二愚)“文以识胜”、郭正域(明龙)“先生之文何其坦直而易明也,于经史则富矣,于才情则壮矣”、孙慎行“淇澳文多用短调,而识者得其浑浑芒芒,而不得以短调目之”、许獬“子逊先生善于取势,此诸家之定评也”等等。这些大家制义风格的描述未必完全符合各家创作实际,但它说明陈名夏是从文章的立场去看八股文的体制特征。

对上述名家制义风格的描述,还能结合各家人品、学识、经历来谈,说明其制义风格形成及变化的原因。如谈李梦阳制义风格便从其为人谈起,指出李梦阳为学有根柢,为人禀浩然之气。“方先生以小臣而抗疏斥大臣,几危其身,然先生由是益肆力于古词,日益有名,其为歌行古风,沉雄悲壮,有杜少陵之遗,及观先生所评杜本似更过之。制义亦奇动以气胜者也。”李梦阳为人坦率,为文则沉雄悲壮,制义自然也是以气胜。又谈王守仁的制义风格着重从事功、学问、文章三者关系去阐述:“昔人有称先生事功而讥其讲学,予心折先生惟讲学乃有事功,亦惟讲学乃有文章。茅鹿门于本朝独爱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记学记尊经阁诸文,以为程朱所欲为而不能;又称抚田州等疏,唐陆宣公、宋李忠定所未逮;又称其利头桶罔军功等疏,条次兵情,如指诸掌人;皆称先生倡明绝学,使数百年知有师弟子之乐矣,而熟知其古文辞乃可为古八家之续乎?予既读其古文辞而又欲传其制义,区区制义之工与否何足以论文成?然制义亦自殊绝矣,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文成之谓欤?在常人眼中王守仁以其事功耀世,在茅坤眼中王守仁是一位文章大家,而在陈名夏看来王守仁是一位制义大家,而他的制义正是从事功、学问、文章而来。又谈王锡爵则从他入仕前后经历不同谈其制义风格的变化:“荆石先生少以雄才称文,何淹通而多思也!然予之所存者有二:一为诸生之文,雍和容与,称名家矣;其一为宦成之文,取材泛滥,而又多失之不雅驯者,此荆石游戏之笔,而学者斤斤奉之为帐中之宝,不几适南而北其辕乎?诸生之心细而手和,宦成之文心粗而手滑。予是以去彼而取此东坡海外文,此其颓然自放时也,而或者以为有加于少作,有是理哉?”

陈名夏还能将这些制义大家放在明代八股文风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其地位。《国朝大家制义》以王鏊为开篇第一人,着眼的正在其是八股文史上确立制义规范的第一人。

洪、永而后,诸将相附丽而起,功业丰采照耀前代,然或学者白首而不能举其一二,而至于守溪之制义且自少至老自名公巨抑以至于童子,莫不高其文辞以为训,此唐宋大家之不能得于当时之人者,而守溪何以服人无异词如此?士穷经义考试凡三岁中是科者,人以为能,且光荣极矣,岂非使人去一于孔孟之道者耶?守溪以前仅仅数公有文名而犹未涉宋体,至于守溪而法

始备。呜呼,盛哉!

洪武、永乐以来,尽管制义的规范基本成型,但在王鏊以前,为制义者多涉宋体,直到王鏊才真正称得上是明体,诚如清代八股文选家俞桐川所说:“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1]《王守溪稿》“题识”)很显然,陈名夏是从八股体制变迁角度认定王鏊的历史地位的,又他对唐顺之(荆川)历史地位的认定也是从明代八股文风变迁的角度着眼的。他说:

先生为古辞后于王遵岩,若制举业之名之盛,守溪而下未有及先生者。茅鹿门亦尝推为本朝第一,将不得为定论耶?……先生之文诚大家矣!如以予所评者,或未进于古法耳,先生中年学欧曾之文,恶知先生不悔其少作耶?然先生古文辞则善于用古法者矣,学者不得其古文而观之,而以制义尽先生,予恐先生亦不以为知己也。

唐顺之是继王鏊而后对八股文体制作进一步完善的制义大家,他的主要贡献就是以古文为时文,关于这一点,他在讨论与唐顺之齐名的另一位制义大家茅坤谈得更清楚。

先生真文之雄也,予尝读《白华楼》古文辞,盖欧曾以下一人耳,本朝李于鳞、王遵严、唐荆川诸人皆不及也。……先生于制义最服荆川,而予以为荆川之文时文也,先生之文古文也。王唐四家并称于世既久,予一旦易之而冠之以鹿门、震川两家,世必有狂笑而欲走者,然先生之文具在,将无有以予言为然者乎?

更值得注意的是,陈名夏在上述八股文变迁史认识的基础上,对明代流行的制义四大家现有格局进行重新认定,将王、唐、瞿、薛四大家之说改为“茅、归、瞿、薛”。其实,通过《国朝大家制义》的编选,陈名夏实际上有着对八股文史进行重新书写的意图。

总之,陈名夏对启祯之际八股文坛流弊的批评,对八股文制作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及对明代制义大家基本风格的认定,都发表了值得注意的看法和有价值的见解,从明代八股文批评史的立场看,陈名夏及《国朝大家制义》应该进入八股文批评史书写的视野。

[参 考 文 献]

- [1]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 [2] 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3] 艾南英:《天庸子集》,台北:艺文馆1980年版。
- [4] 王夫之:《姜斋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5] 俞长城:《百二十名家制义》,康熙年间“可仪堂”刻本。
- [6] 陈名夏:《石云居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
- [7] 彭而述:《读史亭诗集十六卷文集二十二卷》,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
- [8]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 [9] 郑灏若:《学海堂初集》,道光五年(1825)启秀山房藏板。
- [10] 朱国祚:《正文体议》,载《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第一百八十卷经义疏。
- [11] 沈承:《文体策》,载《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第一百八十卷经义疏。
- [12]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 [13] 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康熙二十五年(1686)怀天堂刻本。
- [14] 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 [15] 陈名夏:《国朝大家制义》,明末陈氏石云居刻本。